

#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 “革命”话语之建构

郭 辉

**内容提要**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,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。同时,还弘扬着革命精神,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。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“革命化”,将之当作“国民革命第二期”宣传和建构。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,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,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。

**关键词** 抗战时期 国家纪念日 革命话语

郭 辉,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410081

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“革命纪念日”体系<sup>[1]</sup>,宣传革命历史记忆,弘扬革命精神,抗日战争本身也被“革命化”,当作“国民革命第二期”宣传和建构,以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,也凸显革命延续性,即继承孙中山遗训。印刷手段日趋现代化的现代社会,文本话语的纪念形式比较灵活,成本低廉,且能达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效果。本文拟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中有关“革命”的纪念话语,观察纪念文本对“革命”理念的建构及其面相。

## 一、革命历史

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“革命纪念日”的纪念对象,关于他们的回忆、书写、刻画则是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,而“语言一直都是记忆”<sup>[2]</sup>,能够展示出过去和历史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公布的《革命纪念日简明表》中“宣传要点”明确规定需讲述相关“事迹”或“历史”。政府书告、报刊纪念文章多涉及纪念对象的历史,纪念与历史之间存在难舍难分的关系。纪念是回顾历史,记住历史是纪念的重要目的。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建构革命历史,往往会追溯“革命”时间的起点,并非中华民

---
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”(13CZS037);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“国庆纪念日与民国政治文化研究”(14B123);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资助(13XGG03)阶段性成果。

[1]参见郭辉:《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(1912-1931)》,[北京]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,第202-209页。

[2][德]扬·阿斯曼:《文化记忆》,诊飞译,冯亚琳、[德]阿斯特莉特·埃尔主编《文化记忆理论读本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,第5页。

族五千年历史皆能被称作“革命历史”，起点的设置往往能为“革命”制造合法性基础。

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追溯至“满清入主中国”者。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布告同志同胞书，有言：“民国纪元前，满清入主中国，承二百余年封建流毒，政治的腐败，民族间的不平等，已达极点。且国际帝国主义者，自鸦片战后，挟其政治经济的优越势力，向我国积极侵略。我们中国呻吟于这种的压迫侵略之下，已近百年！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，蒿目时艰，知非先推翻满清，创设民国，无以救中国，集合海内外同志，屡谋革命，积二十年的努力，才于武昌起义，推翻满清。”<sup>[1]</sup>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追溯至“自鸦片战争后”者。1931年总理诞辰纪念日，有人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举行的首都各界代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，称：“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，各国都来侵袭，所有对外，只有割地赔款，国家不成其为国家，岌岌有将亡之势，当时一般人民，都不知道应该怎样，只有总理主张非实行革命，推翻满清政府不可，然后国家才有希望”<sup>[2]</sup>。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确定在“太平天国之后”者。1940年孙中山诞辰纪念，林森在中枢纪念会上报告：“国父生当满清专制时代，那时候政治腐败达于极点。国内承满清专制压迫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之后，以致国力消耗，人民困苦，吏治又腐败到极点。再也不能振作起来。外面受到列强层出不穷的侵略，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把国家陷到次殖民地的地位。”<sup>[3]</sup>所以，才有了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。纪念话语有将革命起点放在中法战后者。1933年《中央日报》为纪念总理逝世发表社论，称：“总理许身革命之初，正中法战后外患方殷之际，目击当日清廷内政之腐败，民众所受之压迫与痛苦，慨然以解除全民族之痛苦为己任，深知非推倒清廷，无以跻民族于平等，于是遂从事其伟大之革命运动，奔走海外，历尽艰苦，终于推翻专制，手创民国。”<sup>[4]</sup>当然，该表述对总理许身革命的时间有误。如此叙述主要指向要“革”清政府“命”，尽量书写清政府的腐败、专制，制造“革命”正当性，属民国以前“革命”历史的起点。

如此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逻辑下，纪念话语叙述反清革命历史，追溯革命历程。1933年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叙述革命党人领导的清末历次起义：“总理以革命领袖，慨然负救国救民之巨任，凭大无畏之精神，奋斗不屈之决心，从事推翻帝制。虽以当时国内民众麻痹之深，清廷防遏之甚，绝不因本党凭藉之薄弱，而于革命之进行，稍有懈弛。用是以有乙丑广州之役、庚子惠州之役、潮州黄冈之役、乙未惠州之役、钦廉之役、镇南关之役、庚戌广州新军之役，数年之间举事九次。自此革命风潮弥漫全国。至庚戌冬季，总理决意在广州再图起事。次年三月中旬，事势愈迫，不容或缓，决于三月十五日起事，至期因军械款项不齐，且部署未妥，清室已闻风戒备，不得已延期举行，其后新军枪械被缴，清吏严查户口，事急势危，遂决意牺牲奋斗，于是此震惊全球之黄花岗悲惨伟大之一役，遂于廿二年前之今日产生。”<sup>[5]</sup>虽如此论述是为强调黄花岗起义在清末诸次革命起义中的重要性，但也悉数历次革命之役，且重点突出孙中山之领导作用，制造出标准的“革命历史”叙事。

1936年，同是革命先烈纪念日，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上报告，叙述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历史：“开国前十七年重九日广州第一次起义陆皓东殉国之后，其次惠州起义史坚如殉国之役、黄岗之役、惠州之役、防城之役、镇南关之役、钦廉之役、河口之役、新军之役，最后乃为辛亥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，即总理所谓十次革命也。此其地域均在西南数省。其他各地同志之受主义熏陶，而与清廷以文字或军事战者，则有刘道一、宁调元、萍醴之役及邹容之死于上海西牢、吴樾之死于北京车站、徐锡麟之死于安庆、秋瑾之死于绍兴、熊成基之刺戴洵死于哈尔滨、温生才之刺孚琦死于广州等，积此诸役，遂使革命思潮，弥漫全国。此时党人不断奋斗，而清吏之压迫亦与日俱厉，其最足以激起中国

[1]《市党部召集各界今晨举行元旦庆祝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1月1日，元旦特刊。

[2]《总理诞辰纪念会志详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1月13日，第2张第4版。

[3]《中枢纪念国父诞辰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0年11月13日，第2版。

[4]社论：《总理逝世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12日，第1张第2版。

[5]社评：《黄花岗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29日，第1张第2版。

革命之高潮,形成武昌起义之收功者,即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一役,故以此役起义之三月二十九日为总纪念日也。”<sup>[1]</sup>此外还有诸多零碎“革命历史”叙述。革命先烈纪念日是唯一明确以中华民国成立前“革命事迹”为纪念对象的国家纪念日,记叙反清革命历史话语具有典型性。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等则强调孙中山个人成长的“革命历史”。国庆纪念日因其纪念时间的特殊性,容易被当做“过去”与“现在”的分界点,而更多的偏向于表达现实诉求。

国民党“革”民国北京政府“命”时,“革命”发生上则有另一番表述。国民党曾经认同北京政府,现要取而代之,必须制造充分的正当理由。1931年国庆,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民书,称:“过去十九年来的国庆,除民国元年曾举国一致热烈举行过一次庆祝外,从民国二年一直至民国十四年,纯为北洋军阀所假借占用”,成为他们腐败无能的点缀。直到“十五年本党克复武昌,打倒军阀;十六年建都南京,继续北伐;十七年完成北伐,统一全国,施行训政,始回复他本来的面目,表现他固有的意义。”<sup>[2]</sup>1932年5月5日,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《“五五”纪念的意义与认识》,强调“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”的革命意义:“自民国二年以迄十年的中间,北洋军阀,暴戾恣睢,解散国会,毁弃约法,祸国殃民,穷极凶暴。其间如袁世凯之帝制自为,督军团之跋扈称兵,张勋之复辟,段祺瑞之祸国,徐世昌之奸恶。不仅把以前革命的成绩,完全摧毁无余,几乎比满清时代的内政外交,还有过无不及,实为公家之蠹贼,革命之障碍,不予廓清,则国民革命不能完成,本党主义不能实现,故总理之就任非常总统,其目的在重整队伍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决斗,使国民革命得以发展,三民主义得以实现。”<sup>[3]</sup>1941年于右任在中枢纪念革命政府成立的报告中指出:“从民国二年到五年,是袁世凯毁法叛国时期,六年夏国会复遭解散,中经督军团及张勋复辟之乱,约法终不能复。”此才有了革命政府成立,孙中山就任非常总统<sup>[4]</sup>。纪念话语为革命叙事的需要,甚至将北京政府与“满清政府”置于一道,称它们“既不知道计划的从事于经济建设,也根本不注意于国家的经济发展,且又加以外力的压迫,使中国经济不能发展。在北伐成功以前,经济上的不振作,可说已达极点”。只有北伐成功,国家才开始了基本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<sup>[5]</sup>。国民党否认北洋军阀同时,树立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,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理由。正是顺着如此逻辑思路,国家纪念日话语将“抗战”作为“革命”的延续,并且“抗战”往往是最终落脚点。毫无疑问,反清革命与北伐的国民革命之间存有本质区别,一者是政权更替,一者是执政者更替,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效化解了差异。

国家纪念日话语还会对民国成立后的“革命历史”进行表述,回顾自民国肇造,国民党在革命道路上的继续努力。1937年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社论,当论及民国成立后,称:“二十六年以来,吾党同志及全国国民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伟大牺牲精神之感召,无日不在艰苦奋斗之中。民国肇建以后,中经二次革命之役、反对袁氏盗国之役、护法之役,以至十五年出师北伐之役,迄十七年始统一全国,而奠定三民主义国家之基础。”<sup>[6]</sup>1935年总理诞辰纪念日,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印发总理诞辰纪念告同志同胞书,以孙中山为中心描述“革命历史”:总理在“武汉一役,建立民国,旋以袁氏窃国,军阀专横,乃继续革命运动讨袁护法,出师北伐,领导国人与一切反革命势力相搏战,曹吴既覆,总理顺从民意,北上主开国民会议,解决国是,不幸积劳成疾,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于北平”<sup>[7]</sup>。此实际上也是在描绘民国成立后国民党之革命历程。1941年10月10日,《中央日报》资料室

[1]《中央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6年3月30日,第1张第3版。

[2]《中宣部国庆日告国民书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0月10日,第1张第1版。

[3]《革命政府成立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5月5日,第1张第3版。

[4]《革命政府成立廿周年 中枢昨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5月6日,第2版。

[5]社论:《三十三年国庆感言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4年10月10日,第2版。

[6]社评: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3月29日,第1张第3版。

[7]《总理诞辰纪念 京各界今晨开纪念会 各商店住户悬旗志庆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5年11月12日,第2张第3版。

编辑《三十年来国庆大事记》，通过编年体形式概述自民国元年以来每年的国庆及时政，从中能反观出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<sup>[1]</sup>。此“国庆”编年体显然为论述国民党实现执政的合理性。

## 二、革命精神

现实政治中的行动者依靠革命精神开展革命活动，革命精神是“革命”的现实维度，且精神的力量非常之大。已经逝世的革命先烈并不能直接影响到现实社会，主要通过革命精神感染革命后继者。国家纪念日话语中的革命精神包括大无畏精神、牺牲精神等，尤其是典型塑造的“黄花岗精神”，也泛指“革命精神”。

“革命精神”成为国家纪念日标语、口号宣传重要内容。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布置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大会，有“彻底肃清腐恶发扬革命精神”标语。“革命精神”可以做更细化理解，如大无畏的精神。193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有文章指出：“我们现在惟有继续先烈大无畏的精神，与暴日长期抵抗，不屈不挠，奋斗到底，为国家争人格，为民族争生存，务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依持着独立自由的地位，先烈抛头颅碧血所换得的中华民国，能够与青天白日长存。”<sup>[2]</sup>194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题为“大无畏的革命精神”的社论，指出：“流芳百世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在三十三年前的今天舍身救国，视死如归。事虽不成，而诸先烈的大无畏精神，实已唤醒了当时全国的同胞，武汉起义的成功，未始不得力于此壮烈的一役。中央把今天永远定为纪念革命先烈的光荣日期，就是要鼓励后死的同志都效法先烈牺牲的精神，鼓励全国的同胞都发扬先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”<sup>[3]</sup>论者试图宣示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，也希望后人能效法先烈再接再厉。

奋斗的精神。革命要取得胜利，必须勇于奋斗。1931年国庆，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大会会场布置，屡见“奋斗”标语，有“要国庆后永远消除国难，只有作最终的奋斗，光大国庆”、“团结奋斗”<sup>[4]</sup>。1933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元旦纪念大会的口号中也有“继续先烈奋斗精神”<sup>[5]</sup>。辛亥革命所以能取得胜利，离不开先烈们不断奋斗。1933年张元良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革命先烈纪念日纪念大会上称：“一八九五年九月九日，就是第一次的广州之役，自此以后继续不断的奋斗，再接再厉，直到三二九起义的时候，共计起义凡有十次，而失败者也有十次之多，每经一次的失败，虽然不免有所牺牲，但是本党同志，反而益加奋发。”<sup>[6]</sup>如此才有革命的最终胜利。

牺牲的精神。193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国民党中央南京办事处纪念大会上，汪精卫报告指出先烈精神的第一点即是“革命先烈那种牺牲的精神”。他认为黄花岗起义中大家都知道没有成功希望，但是“仍然以牺牲的精神，继续干下去”。并且，那次起义已经有数月预备，“各方面的统治，亦通通晓得，南洋的同志更倾家荡产来资助，虽时机已经泄露，如果不继续干去，则不特无以对国内国外的同志，而且革命的进行，亦将因此而受绝大的打击，所以他们知道会失败，却决定继续进行，为什么他们明知失败而仍要进行呢？这便是牺牲精神的所在。”这种牺牲精神更是“创造中华民国的基础”<sup>[7]</sup>。193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，《中央日报》社论称：“黄花岗烈士之牺牲精神，昭示吾人以完成革命事业之路径，革命系为整个民族之生存，有时不得不抛弃个人及家庭之幸福，革命非徒托空言，须以头颅与

[1]参见本报资料室编辑：《三十年来国庆日大事记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10月10日，第3版。

[2]《纪念黄花岗殉难烈士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3月29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3]社论：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3月29日，第2版。

[4]《中央举行国庆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0月11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[5]《市党部召集各界今晨举行元旦庆祝大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1月1日，元旦特刊。

[6]《京市各界昨晨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30日，第2张第3版。

[7]《中央南京办事处昨晨举行先烈纪念》，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3月30日，第1张第3版。

热血为代价。在此抗日救国声中,革命先烈奋斗牺牲之往事足以为吾人之重要教训。”<sup>[1]</sup>

革命精神在革命先烈纪念日中有时被冠以“黄花岗精神”。1941年革命先烈纪念日发表纪念文章认为:革命先烈在黄花岗之役中的牺牲最为重大,“吾党精英牺牲于是役者,亦最为惨烈”。而革命成功则必须要有革命精神,“我们相信要实行革命的行动,必须有革命精神,要完成革命的事业,更必须有革命精神。黄花岗精神,是革命精神的结晶。”<sup>[2]</sup>黄花岗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精华部分,两者似乎不能完全划等号。1943年革命先烈纪念日,于右任在中枢纪念典礼报告称:黄花岗之役以“奋斗最烈,牺牲最大,影响最深”而成为“本党精神最高度的表现”,此后“本党的主义与力量,方引起了世界的敬重,侵略了满清的中枢,唤醒了国人的迷梦”。而黄花岗并非“是一个土堆,也不是七十二烈士的陵墓,而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的正气的象征,也就是为本党主义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精神堡垒”<sup>[3]</sup>。1942年革命先烈纪念日,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的社论将革命精神与黄花岗精神几近等同,指出:“一心一德,奋不顾身,不屈不挠,再接再厉,必求最后成功而后已:这是我们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。”革命先烈们虽有岗位之异,但他们“所抱持的精神却是绝对相同,这就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也就是黄花岗精神。黄花岗精神不是七十二烈士所独有,而系一切革命先烈所同具”<sup>[4]</sup>。

### 三、抗战革命

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革命话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抗战革命化,试图让全国民众在国民党领导下如当年“革命”般取得抗战胜利。从国民党历史的发展历程则容易理解“革命”之重要性,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,再到“抗战革命”,使国民党的战争行为更具延续性和正当性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国家纪念日话语即将对日战争视作国民革命之继续,只是尚较模糊,未见“抗战”一词的严格表述。1931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,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“总理诞辰纪念告同志同胞书”,认为“现在暴日帝国主义,绝灭公理正义,破坏世界和平,挟其一国的强力,向我大肆侵略,其欲吞并我国家,灭亡我民族,已昭然若揭”,号召继承总理的遗志,学习总理人格精神,奉行总理主义方略,以“必死之决心,誓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斗,国民革命才能成功,三民主义才能实现”<sup>[5]</sup>。此时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尚未成功。革命未成功的话语充斥于国家纪念日纪念。1932年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,宝觉苍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会上同样认为,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,只有本着“总理亲爱精诚之精神,团结一致,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,应付外侮,始能过渡国难,革命始能成功”。不过,革命未能成功是“各地之军阀官僚等腐恶势力,潜滋暗长”<sup>[6]</sup>,将之归于内忧外患。此时因国共对抗,孙科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革命政府成立纪念会上,认为:“要恢复总理的革命精神,要巩固革命势力,集中全国民众革命的力量,对外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,对内肃清破坏革命战线一切的恶势力,使国家民族能够继续生存,使革命使命能够依据总理遗教完成”<sup>[7]</sup>。随着国共合作抗战,关系缓和,纪念话语中国国民党人将“革命不能成功”的原因归于外在方面。1937年革命先烈纪念日,黄其弼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纪念大会上指出:“我们今天纪念先烈,应该要继续先烈牺牲的精神,打破革命的障碍,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革命不能成功,不是内在的原因,而是外来的压迫,我们国家正在建设

[1]社评:《黄花岗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3月29日,第1张第2版。

[2]《发挥黄花岗精神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3月29日,第2版。

[3]《中枢纪念革命先烈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3月30日,第3版。

[4]社论:《黄花岗精神与抗战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2年3月29日,第2版。

[5]《首都各界今晨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1年11月12日,第2张第4版。

[6]《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大会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2年5月6日,第1张第3版。

[7]《中央国府举行革命政府成立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3年5月7日,第2张第2版。

途中迈进,要人人具必死的决心,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。”<sup>[1]</sup>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临“内忧外患”,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的孙中山遗训发挥其效应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,纪念话语对“抗战革命”表述得更为明确。1937年国庆,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上,将“目前”视为“国民革命的后半期”,目标在“为中华民国的生存而奋斗,为中华民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,其奋斗的表现,是抵抗日本的侵略,打倒日本的侵略主义”。而“国民革命的前半期”,则“曾为着国内的统一,而艰苦奋斗,如今我们可以说奋斗的结果,统一已经告成了。我们从今以后,可不比再浪费力量作对内的了,我们同胞同志的每一点血,每一个钱,都用在抵抗日本的侵略,打倒日本的侵略主义”<sup>[2]</sup>。如此,将目前的抗日战争表述为“国民革命未能完全成功”更为精确。同年,马俊超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国庆纪念大会上报告,也表达了类似意思:“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,第一步是要求统一,第二步是为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平等。现在正是实行第二步的开始,越发有庆祝之价值。这第二步的工作,只要一贯彻,即或使本身一代之幸福,因之减少,但可以减少子孙万世之痛苦,而其幸福可以比现在加多百倍千倍。”<sup>[3]</sup>国民党元老张群在1938年国庆纪念日撰文,直截了当的将“抗战建国”称为“国民革命的第二阶段,我们要以不胜不成的信念来贯彻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大使命”<sup>[4]</sup>。抗日战争即国民革命第二步为国家“独立自由平等”。

后来,抗战被称为国民革命第二期。193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,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告同志同胞书,称“回溯十四年来,本党虽有第一期国民革命的成功,树立了统一的革命政府,与奠定了实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初步基石,可以奉慰总理在天之灵,然而狂暴的日本帝国主义,深恐本党革命成功,足为其大陆侵略政策之暗礁,乃欲凭武力摧毁我革命,灭亡我国家”。而此“国家危急存亡之秋,我们纪念总理的逝世,不禁百感俱集,然一念及我们所负责任的重大,我们正应秉承总理遗训,踏着革命先烈及抗战伤亡军民的血路,努力迈进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完成我国国民革命之大业”<sup>[5]</sup>。与第一期国民革命对应者即隐含的“第二期国民革命”。1941年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,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,指出:“北伐是革命的开始,抗战是革命的完成。在国内阻止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,是封建的军阀。在国外妨害我们革命势力的成功,是帝国主义者。”并且“扫荡国外的帝国主义者的工作,当然比肃清国内军阀,更为艰巨。这事业如不能完成,则革命尚不能谓为成功,甚至难保没有失败的忧虑。我们既然于极端困苦的环境之中,完成了北伐的使命,结束了第一期国民革命的工作,便不能不再向第二期的革命工作,开始进行”<sup>[6]</sup>。1943年7月9日,《中央日报》为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发表文章,指出:“北伐是扫除抗战的障碍,而抗战乃是完成北伐的志愿。北伐统一,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使命;而抗战建国乃是国民革命第二期的使命。”<sup>[7]</sup>纪念话语似乎越来越清晰的描述抗战的革命性质,抗战作为“革命”也越来越具独立性。

如此背景下,国家纪念日还宣传了其它抗战革命化话语。如,1943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,《中央日报》发表社论,将“中国的民族抗战”视为“国民革命必至的一阶段”,但是国内的一些人士对于革命,特别是“七年来革命抗战的血迹,视若无睹。……然而三民主义的革命抗战的志士,决不因此而馁气。我们有我们的主义。我们有我们的方略。我们有我们的理想。我们自始就相信伟大的领袖,以其不屈不挠不激不随的负荷艰巨克服艰危的精神,必能感召我全民族,团结我全民族,共

[1]《首都各界昨举行革命先烈殉国纪念会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3月30日,第2张第3版。

[2]《中央昨举行国庆纪念 汪报告纪念意义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10月11日,第2版。

[3]《首都各界举行国庆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7年10月11日,第3版。

[4]张群:《国庆日题词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8年10月10日,国庆纪念特刊。

[5]《市党部发表告同志同胞书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9年3月12日,第4版。

[6]社评:《北伐与抗战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7月10日,第2版。

[7]社论:《扩大伤友运动——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献辞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7月9日,第2版。

出一途,以共赴一的,使革命抗战克底于成”<sup>[1]</sup>。文章几次用“革命”形容“抗战”。1944年国庆,蒋介石在对全国军民的播讲中,也多次用到“革命抗战”一词,其中一处称:“敌寇汉奸已至山穷水尽的时候,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力量,更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,足以使我们革命抗战失败,使我们国家基础动摇,只要我们看破他的空虚,揭穿他的诡秘,他就无法得售其诡计。”<sup>[2]</sup>“革命抗战”的出现保持了抗战的独立性,同时也揭示了抗战的革命性。蒋介石在1939年国庆日告全国国民书中,还使用到“抗战革命”一词:“吾人今日抗战革命,诚不能讳言当前之困难,且必预期更有严重之困难;然就吾人今日之国际关系,经济状况,与军事力量,种种革命基础而言,较之任何国家之革命,均为雄厚而坚强,故关键全在吾人有无努力牺牲之决心,与承继革命先烈事业之勇气。”<sup>[3]</sup>“抗战革命”似乎关注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抗战革命的革命逻辑体系。1941年3月29日一篇纪念黄花岗先烈的文章中称:“革命的事业是艰苦的,革命的事业是灿烂的,从推翻帝制到北伐,从北伐到抗战,革命的精神是一贯的。”抗战被称为“革命的抗战阶段”<sup>[4]</sup>。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、打倒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、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抗战革命,显然是一脉相承的。

全面抗战爆发前,革命建国主要是与革命先烈相关。七七事变后,随着“抗战建国”口号的提出,纪念话语中革命建国也逐渐与抗战联系在一起。1938年,蒋介石在纪念国庆告全国国民书中,提出要“彻底省察一下我们革命建国的理想,更清楚的认识国家的前途和自身的使命”。他还认为“三民主义革命建国的理想,……只可惜这一个革命建国的理想,在过去二十多年来,向不为全国多数同胞所切实奉行,外未能得到世界各国深切的认识,以致中国革命的成功,延滞至今”。所以,他要求国民要继承革命先烈“创造民国的英勇精神,不怕牺牲一致奋起,奋力抵抗,消灭暴敌侵略的狂焰,争取民族的独立平等,实现我们一贯的革命建国的理想”<sup>[5]</sup>。言外之意,蒋介石将原本是革命先烈理想的革命建国用来形容抗战,尚未能实现。其实,这只是实现了一个转换,既然抗战是一场革命,有抗战建国,也可以有革命建国。抗战被革命化后,抗战的战士也被称为革命战士,1941年革命先烈纪念日,《中央日报》发表文章,即有“革命战士”之称谓:“今年是抗战胜利开始之年,宜昌对岸和赣北的大捷,就是事实的证明。中国军队是革命的,中国国民党领导下之全民族战争,每一个人都是革命战士,不论是那一界,每一个团体,每一个角落,都充满着革命的战士!这个排山倒海的力量,谁能阻遏革命的成功。”<sup>[6]</sup>革命可以用来形容与抗战相关者,纪念话语广泛建构和传播“抗战革命”。

国民党靠“革命”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,也靠“革命”消灭民国北京政府,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。“革命”既是国民党政治遗产,也是其“传统”政治文化。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,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疯狂侵略,即利用“革命”抵抗日本侵略。此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留下的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遗言相契合,革命理念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。

[责任编辑:肖 波]

[1]社论:《伟大的感召力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12月25日,第2版。

[2]《迎接抗战中第八度国庆 中枢昨举行隆重纪念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4年10月11日,第2版。

[3]《二十八年国庆纪念蒋委员长告国民书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9年10月10日,第2版。

[4]《发挥黄花岗精神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3月29日,第2版。

[5]《二十七年国庆纪念蒋委员长告国民书》,《中央日报》1938年10月10日,第2版。

[6]《发挥黄花岗精神》,《中央日报》1941年3月29日,第2版。